

石川达三作品系列

shi chuan da san zuo pin xi lie

Y  
I  
Z  
U  
O  
W  
E  
I  
L  
E  
以作恶为乐

一日 石川达三 / 著 金中 /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译

本

思辨读三传故事例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TRANSMISSIONS

# 以作恶为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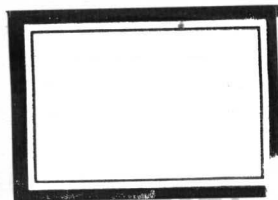
《左传》卷之三

——

《左传》卷之三

——

《左传》卷之三



[日] 石川达三 / 著  
金 中 / 译

shì chuān dà sān zuò pīn xì liè

**以作恶为乐**

**石川达三作品系列**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以作恶为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作恶为乐 / (日)石川达三著;金中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2940-9

I. 以… II. ①石…②金…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B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094 号

悪 の 愉 さ  
石川達三

---

根据昭和五十六年九月三十日第四十七次印刷  
角川文库版译出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229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6.00 元



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



石川达三先生故居



1956年5月石川达三访问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 内 容 提 要

《以作恶为乐》是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先生一部极具可读性的针砭时弊的社会小说,在我国首次翻译出版。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极端自私、凶残愚蠢、荒淫无耻、可悲可恨而又可恶的小人物:他为了寻求刺激,诱奸女职员;他借了同事的钱,不但赖账,还奸污那个同事的妻子;他的女友康代债台高筑,向他借钱,他乘人之危,夺取她的贞操;他怀疑胁坂与他妻子通奸,便对胁坂百般敲诈,敲诈不成,恼羞成怒,就用鞋带将其勒死。其罪行败露后,他怕受极刑,纵身跳楼,想了此罪恶的一生,但自杀未遂,最终躺在医院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以作恶为乐》堪称一部形象的犯罪心理学教科书,一幅清晰的日本现代社会的解剖图。该书在日本极受读者欢迎,印刷版次达四十七次,至今仍畅销不衰。

中国の皆様

石川がなくなりまして、十三年たちましたが

金中さんとの  
御厚志と大変な御努力の

により、彼の書き遺したものが

こうして皆様にお読み頂けることを

ありがたく深く感謝中（あげ）をりま

平成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石川代志子



## 致中国读者

石川去世已过去十三年了。

由于金中先生的厚谊和异常的努力，他的遗作得以这样完美的形式出版，使读者能读到他的作品，兹致以深切的感谢。

石川代志子

平成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 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旗帜

——金中译“石川达三作品系列”序

李 芒

世界各国的文学，都有一个从古代跨入近代的过程。日本文学的近代化是从明治维新(1868)以后不久起步的。对传统的日本文学来说，这是一个飞跃。自此开始吸收西方文学的思想特点和创作手法，从文言逐步走向白话，无论在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都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变革。

关于传统的日本文学，著名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曾经指出：“日本文学，特别是接触欧洲文学以前的文学，其理念称作‘感物兴叹’、‘幽玄’和‘闲寂’，即以优美为主。外表即便单薄，余韵却是深幽的，‘具有盆景艺术’的特征。”然而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引进西方文学，促使日本近代文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比较明显地呈现出新的面貌。

简略地回顾一下，明治维新以后，吸收西方文学的历程，大致是以1879年的小说翻译为嚆矢。继而，在诗歌方面也紧紧跟上。1882年出版的《新体诗抄》，共收载新创作诗五首和翻译诗十四首。值得提起的是坪内逍遥于1885年发表新小说理论《小说神髓》，翌年又有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总论》问世，基本上都是提倡进化论和写实主义。二叶亭四迷于1887年发表的小说《浮

云》则是这种主张的实践。接着，川路柳虹等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表现出新的面貌。这一切，都在亚洲比较早地刮起了一股近代文学的新风。

经过这场重大变革之后，日本文学的创作方法，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相继出现了现实主义（起初写作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等流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涌现出不少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石川达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石川达三 1905 年生于日本北部的秋田县，父亲是中学英语教师。中学时代，他即以作文优秀知名。后来肄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由于退学后当了一名杂志的编辑，得以独立维持生活，便投身于小说创作，很早就对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和思想产生了共鸣。他那时的作品并未受到文坛的青睐。

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恶性膨胀，对外悍然发动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战争，对内进一步制造白色恐怖，疯狂地镇压革命文学运动，加紧进行思想统治和政治压迫。当时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经济每况愈下，工人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政府居然以移民海外当做摆脱困境的对策。正当石川徘徊于这个“危机年代”，渴望打开一条出路的时刻，经过新结识的一个移民公司职员的介绍，跟随移民团远度重洋前往巴西。石川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从头至尾深入体验、观察和记录了移民中各类人物的生活和处境。

1935 年，石川以此次移民的生活为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苍氓》获得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登上了日本文坛的龙门。

“苍氓”即一般老百姓，一群走投无路的芸芸众生。日本政府让他们长途跋涉到巴西去另谋生路，美其名曰“移民”，实际上只

不过是一批“弃民”而已。石川达三深怀同情和激愤，仿佛扛着一架灵敏的摄像机，巧妙地从各个角度把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和悲欢离合摄入镜头，构造了一个移民生态的万花筒，把日本那个时代的弃民命运生动深刻地载入文学史册。这不管是一把利刃，将日本政府的骗术纵横切割，加以肢解，进行病理分析，并以感人的艺术公之于众。

1930年，在无产阶级文学遭到血腥镇压以后，资产阶级文坛也陷入迷惘的境界，不少作家或保持沉默，或躲进象牙之塔，沉浸于艺术美的追求。唯独石川达三，既摆脱专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的束缚，又舍弃西方各类现代派形式主义文学的探索，深入社会生活的下层，以反映现实为己任，决心“脱离文坛的主流，孤独地走自己的路”。《苍氓》，包括后来发表的相当于它的第二部《南海航线》和第三部《无声的民众》，应该说是石川达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雄辩地证明：石川达三，作为一个作家，敢于面对风云多变的现实，力求真实地加以反映，走了一条独辟蹊径的正确道路。

1936年，日本老一代的军国主义者们对全面侵华的时机，正在踌躇未定的时候，一批少壮派反动军官突然发动“2·26”军事政变，武装袭击大臣官邸，杀死若干幕僚。他们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同苏联、中国和英美等国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指责老一代当权派腐败透顶，对外政策软弱无力，并号召尽快向外扩张，以显示实力。结果，这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少壮派虽然遭到镇压，却有力地促使老一代法西斯分子迅速采取铤而走险的行动，悍然于翌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闯进了中国人民战争的罗网。

石川达三，在这场不义战争的初期，1937年10月，作为日

本《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记者到我国华中一带活动，主要采访了高岛师团侵略军攻打上海及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主要城镇，直到攻占南京的侵略行径。日本法西斯军部所以会批准他前来，原本期望他把侵略军的旺盛士气和节节胜利传达给后方国民，使他们受到鼓舞。然而，事与愿违，石川于1938年1月回国后，仅用12天就写完了一部光照史册的名著《活着的士兵》，发表于《中央公论》3月号。不出所料，杂志立即遭到查禁，石川本人受到禁锢4个月、缓刑3年的惩处。罪名是，在作品中描写了“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进行的杀戮、掠夺和军纪松弛的情况，以及破坏安宁秩序的行动”。关于这方面的描写——自从四十年代初有人将这部作品译为中文以后，在我国就存在不同的看法，直到今天，这种分歧依然没有消除。因此，下面必须比较详细地加以引用，作为笔者进行分析的依据，并期能够让读者有所了解。

一、关于侵华日军的怀乡厌战行动和情绪的描述。日军高岛师团从中国大沽港登陆，转道北京开赴大连。士兵猜度“一定是去满苏边境”，“同苏联打仗”，“俄国陆军很可怕”，前途“只得听天由命”。于是他们“突然想起了故乡的山河，看来没有指望回家了”！（中译本第1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引文同此书）仓田少尉在信中写道：家乡的“和平生活多么令人向往啊！”列车抵达当时的奉天车站转弯南下，他们又以为是“凯旋回国了”。个个“兴高采烈，尽情欢乐”，有些人竟然在大连“买了礼物，准备带回故乡去”。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轮船向上海方向驶去以后，都“撅着嘴”“把礼物扔进波涛里”去了（13页）。及至包围和准备攻占上海时，“船舱中的一百八十人都默默地意识到明天将会阵亡，气氛十分悲凉。”（14页）全篇中，诸如此类的描述可见于不少地方。

## 二、关于烧杀抢掠和蹂躏妇女等暴行。

作品开端描写高岛师团于日军攻占北京以后，从大沽港登陆，集结宁普期间，团部借住的民房突然起火，日军抓住一个约摸二十二三岁的中国青年，经过日本翻译官盘问，向笠原伍长报告说：“这家伙说，房子是他的，他愿意烧掉就烧掉，那是他的自由。”于是笠原伍长就将这个青年砍死。作者描写说：“对笠原来说，杀人是家常便饭”。

在侵略日军逼近支(直)塘镇时，士兵们抢了老太婆的一头水牛，作者写道：“大陆确实有丰富的资源”，“居民的私有财产就像野生果实一样，可以让士兵们随心所欲地任意摘取”。完全占领支塘镇以后，“征用”一词竟然成了士兵们任意外出的借口，“接着又被他们当作一种隐语，‘征用鲜肉’，意思就是到外面去找‘花姑娘’。”果然，一次他们在倒塌了的房屋里发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谁知那女人向他们开了一枪，但没打响，于是被他刺死，随后赶来的笠原伍长一瞧，说道“多可惜呀！”(24—25页)

11月25、26日日军攻占无锡期间，部队厨房的白薯丢了，武井一等兵怀疑是“一直帮助做饭，干活也不错”的中国青年炊事员所偷，便把他推到池塘边刺死(47页)。部队从无锡出发时，把借住的民房烧掉，表示决不再回来了(49页)。

12月1日以后，日军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形势。出外巡视的奈加目少尉，在一个胡同口被一位十一二岁的中国小姑娘用手枪击毙，日兵连发数枪打死了逃到屋子去的小姑娘，同屋的一位老妇人也未幸免。这时“极为愤怒”的日兵说道，“所有的中国人都该杀，对他们客气，我们就得倒霉！”作者接着叙述说：“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因为极其微小的嫌疑，或者根本没搞清是什么原

因就被杀害了。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难以区别的情况下，这种惨事多得不可胜数。”(55 页)

日军对待中国俘虏，实际上都是就地处决。笠原伍长等就在进攻南京前砍死或枪杀了十三个俘虏，惨状不忍目睹。(56—57 页)

日军攻打和占领南京，使得那里遭到惨重的破坏，“留在南京的居民统统被赶到难民区里，总数约二十万。其中混进了一千名左右的正规军。在其他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的影子，到处都是日本军人在闲逛”，“去‘征用’物资”。街道上的商店几乎被洗劫一空，偌大的南京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物资了”。仓田少尉对排长们说：“南京市损失的财富恐怕有几十亿吧！幸亏这场战争在中国打。国家财富受损失，良民衣食无着，女人们被蹂躏。……”(72 页)

石川达三只写到把二十万南京居民赶到难民区里，并说明里面夹杂着一千名正规军，但没有下文。但不难想象日本法西斯军队决不会轻饶这些所谓“战斗员和非战斗员难以区别”的中国人，统统杀掉乃是必然的结果。作者竟然冒行文有始无终的毛病，应有下文而戛然止住，其中必有缘故。一是作者接下去写了如何处置这二十万中国人，被检查机关等删去；二是作者意识到问题严重而有意未写下去。如果是后者，作者满可以根本不去接触这个问题，而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留下破绽。因此，那原因就可能在前者。又据吕元明教授说，战后石川达三曾经否定过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估计同作品中的这种龃龉现象也可能有某种联系。然而，不管是未曾正面描写也罢，还是矢口否认也罢，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狡辩，只从这本《活着的士兵》本身暴露出的蛛丝马迹，也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血腥事实了。

总之，南京沦陷以后，日本军队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残杀 30 万以上的平民，乃是众所周知的铁的事实。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何况他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揭露事实，而在于探索人一旦投身于战场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会忘记，关于石川笔下的《活着的士兵》，著名文学评论家山本健吉说过这样的话：应该看作是在于唤起人们对于日本军队的“理解和爱情”，可以说是“一本对日本军队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书”。这些话，既可能为石川达三辩护，又可能反映了石川的现实主义尚存在不彻底性。事实上在本国法西斯主义疯狂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面前，在用文字加以描写的时候，他不可能毫无顾忌，那么大胆放手地反映真实情况。

石川达三为此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以后，也未能承受住那巨大残酷的压力，于 1938 年 11 月等待判决的蛰居期间写了《结婚的实态》，表示忏悔之情。翌年出版《堕落的诗集》，歌颂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警察耐心改造妓女的“善行”，复于 1940 年上梓《武汉作战》，美化日本的“圣战”，以示赎罪。为此，石川在战后不久也曾受到指责，被列入整肃的名单。这使他感到不满，便在 1949 年的连载长篇小说《风中芦苇》中有所流露。主人公苇泽良平，是一个民主自由主义者，在他担任《新评论》主编的过程中，同军国主义政府的检查制度和法西斯军部进行了既坚决又有妥协的斗争，处境十分艰难和险恶。其妥协的行为，战后遭到民主阵营的追究，一度处于尴尬的境地。这部作品曾经轰动文坛。

尔后不久，石川摆脱困境，恢复创作的旺盛活力，连续出版了《人墙》(1959)、《金环蚀》(1966)等，成为战后批判现实主义丰碑式的名作。《人墙》的主题，是日本教职工工会争取民主办学的斗争。作品描写一个女教员，在为生活、为民主而斗争中的成长



过程，揭露日本教育界的黑暗，情节曲折复杂，人物性格鲜明，可读性较强，影响很大。

1956年，石川达三作为亚洲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团长访问我国、前苏联、蒙古等国，使他大开眼界。回国后不久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组题为《世界变了》的评论文章。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惊人的，整个社会充满朝气，生活愉快。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生活的安定得到了保证。”他指出，这种“巨大的变革”是“明确的国家意志所创造的成就”。因此，他感到“自由主义国家已经过时了”，“不能再安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因为“世界已经变了”。

石川很可能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鼓舞，使得《人墙》这部小说将社会派小说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记得，石川在这部作品问世以前的1959年4月14日的《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声明说他“已决定了自己的旗帜”。他坦率地承认，“开始写作时我的立场是一张白纸，既不想责难自由民主党的文教政策，也不想替教职员工会辩护”，但在深入调查和探索过程中终于使他决定站在“反对保守政党的自由立场”，而《人墙》这部作品就是自己的“公约”。他并且坚决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去这种“言论表现的自由”。

石川达三就在这种坚定的信念指导下，于1966年又完成另一部名著《金环蚀》。60年代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这时期日本政府的高官们互相倾轧，无所不用其极。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主要人物也皆非凭空虚构。总理大臣同他的对手——保守党的另一个头目，为了争夺总裁宝座，分别挥霍了18亿和20亿日元巨款，收买议员，互相揭短，闹得乌烟瘴气。前者终于夺得总裁宝座以后，再次出任总理大臣，为了填